《沉沦》的爱国情感与个人情感之辨
——愤世之情与被压迫感的产生[1]

傅智伟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39–47 页

内容提要：不必怀疑郁达夫后来的爱国言论和行为，但他留日时期写作的《沉沦》表达的并非爱国情感，而只是个人的情感。伊藤虎丸的民族屈辱感之说虽然比爱国情感更为接近《沉沦》的事实，但它同样将《沉沦》政治化了，把主人公的情感视为民族情感。《沉沦》表达的毋宁说是属于个人性质的愤世之情和被压迫感。郁达夫视诗人为现世的被压迫者与反抗者，并以这样的诗人自居。这是郁达夫接受《夜宿》中的愤世思想的基础，也是《沉沦》表达的愤世之情的根源所在。主人公被压迫的情况实则是虚拟的，被压迫感出自于他的自我想象。郁达夫对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的接受是理解《沉沦》主人公的被迫害感的关键，主人公将自我想象为屈原一类的被迫害的诗人了。

关键词：想象自我　唯美主义　爱国情感　民族情感　生活模仿艺术

WATERBASED

一、还原爱国情感为个人情感：愤世之情与被迫害感

在西方国家通过侵略强制性地将中国纳入世界秩序之后，中国人对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的想象从贵我贱他的“华夷之辨”变为了贵他贱我的“中西之分”。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中西的空间之不同被赋予了时间的含义：东方的中国是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西方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在历史进化上要落后于西方许多世代。因此，“中西之分”中又暗含了“新旧之别”。文化的落后被认为是中国各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曾经处处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在向西方学习之后，经过明治维新，很快地成为了西方列强之一，更证明了若不摆脱文化中国、不学习西方文化，便不能自强。中国文化传统的不足凭恃已成为共识，通过日本向西方学习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当时，一方面日本成了中国的导师，另一方面日本的侵略加剧了中国在近代的衰落。所以从晚清到民国的知识分子对日本有着双重的、矛盾的态度，这种态度更为明显地体现在留日学生身上。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将中国种种落后的情况与日本物质文明的发达和日本文化的先进对比，认同于日本这个新兴国家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这种认同不但包含了国内知识分子对作为西方一分子的日本的抽象认同，更包含了具体的日常经验和深层心理上的认同。所以伊藤虎丸说郭沫若、郑伯奇、郁达夫等中国留学生因中国的落后而感到悲哀，同时他们通过在日本习得的“日本的眼光”看到了中国的可侮和中国大众的不觉醒：

> “郭沫若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看到了支持着日本急速地向近代化成长的是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他穿的也可以说是象征日本近代化的‘帝大制服’，用日本的眼光看到了（或者说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的不要强、没出息的落后性。他的那种委屈的感情，正是由矛盾着两个不同的角度促成的，因而具有双重性……这样的‘民族主义’，从郑伯

1 本文为傅智伟硕士学位论文《郁达夫与〈沉沦〉的爱国情感与个人情感之辨》（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年）的部分内容。

比较-正文.indd 39 17-12-14 下午4:14

> 奇的《最初的一课》和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中，也同样表现了出来。一方面是对日本人轻蔑中国的激愤、另一方面是‘弱小民族的悲哀’。”[1]

郁达夫具备了“日本的眼光”或者说是“西方的眼光”，所以郁达夫和他的主人公们“以半殖民地特有的态度崇拜外国文化。”[2]郁达夫赞许日本民族明治维新以来的发展，而对落后的中国和不知奋起的中国人怀有一种羞耻感。最能说明郁达夫这种态度的是以下这段话：“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荡，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这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3]这段话中，新兴国家日本的“新”和东方古国中国的“古”恰成对照，而在当时“古”意味着落后，即郁达夫所说的文化落伍。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律条判决说落后的东西必然将在竞争中消亡，所以落后的中国被侵略和中国人被欺辱在郁达夫看来也就变成了“咎由自取”的事了。同样是出于进化论的逻辑，当时的中国人在郁达夫眼中成了在进化论链条中的原始生物。郁达夫对故乡的中国人的形容是：“大多数百姓，却还是既无恒产，又无恒业，没有目的，没有计划，只同蟑螂似地在那里出生，死亡，繁殖下去。”[4]郁达夫刚回国时对中国人的形容是“上下交争利，后先不见人”，即“人少畜生多”之谓也。[5]这两个比喻将国人看作劣等生物，揭示了郁达夫的真实心态。郁达夫留日时期写作的小说表现了这样的心态。他写于1919年的未刊稿《两片巢》中，“他们两人最怕被人晓得他们是中国人”。[6]这两个人里有郁达夫的化身，那个厌世、易哭泣的发种种的少年。又如《空虚》中的主人公得意地用他日本大学生的制帽向人表明他的身份时，心里想到的是中国人身份的卑贱，认为日本大学生的身份为他赢得了名誉（181）。又如《沉沦》中的主人公在侍女的追问下，才“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70）。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逃避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不但是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歧视，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同样看不起中国人。他们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郁达夫留日时期的小说的主人公不但不具有爱国情感所要求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反而为生为中国人而感到屈辱，这种民族屈辱感无论如何是与爱国情感不同的，它不但不是对中国和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而且是对它们的逃避。主人公身上的民族屈辱感标识了主人公的民族身份，但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却是以主人公拒斥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方式显现出来的。“民族屈辱感”一词在这里意味着主人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羞耻、屈辱。主人公在日本女子面前的自卑感也正是这种羞耻感的表征。这种民族屈辱感没有将主人公与自己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而是使得他们更加分离。因此，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沉沦》主人公的情感与其说是爱国情感，不如说是民族屈辱感，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感到屈辱。这种民族屈辱感产生于主人公的民族身份，但又否定了他的民族身份，名为民族的，却是个人的。

以上论述得自伊藤虎丸的启发。他用民族屈辱感说明了郁达夫对中国的情感的性质，但他没有注意到民族屈辱感的个人性质。不论是爱国情感还是民族屈辱感，它们所关注的始终是郁达夫的情感与中国的关系，将之视为一种民族情感。可实际上，《沉沦》主人公的情感更为私人化，他关注的始终是自己，而非自己与祖国的关系。“那侍女的负心的东西，你竟敢把我丢了么？罢了罢

1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2 黎德机，《混乱还是一致？——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与郁达夫〈沉沦〉三部曲》，见李杭春等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1页。

3《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

4《郁达夫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3页。

5《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

6《郁达夫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比较-正文.indd 40 17-12-14 下午4:14

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71）。这段话的辞修很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主人公在将中国看作自己的情人的时候，也将祖国和日本侍女放在同一位置上，身份低下的日本侍女和祖国都被主人公看作可能的情人。这时，他无视了敌国日本的女子、地位卑微的侍女和作为祖国的中国之间存在的民族仇恨的区隔、低贱和高贵的对比以及个人情感的琐屑和爱国情感的崇高的不成比例。主人公绝不是将日本侍女的地位拔高到祖国那么崇高，而是将祖国作为日本侍女的替代物。日本侍女和祖国都只是主人公欲望投射的对象，而非主人公要为之献身的偶像。主人公所关注的一直是他自己，他爱的也只是他自己。主人公因为感到从日本侍女那里获得爱情是无望的，因此转向祖国去寻求情感的安慰。在情感对象转移的过程中，重要的始终是主人公的情感需要一个寄托的对象，而不是他要为对方付出。所以这段话不但不能说明主人公具有任何爱国情感，相反地，在修辞上还贬低了祖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从始至终关注的对象是他自己，而非自己与祖国的关系。

另外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与《沉沦》主人公的欲求是什么关系，中国在这里代表了什么，主人公的思乡意味着什么？《沉沦》中的中国成了被思念的故乡，而这故乡是抽象的。故乡存在的意义在于对主人公在日本的处境作出反向的说明。“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46）！主人公的处境越是使他苦闷，他越是思念作为故乡的祖国，却相反地说明了前一情况。连主人公自己也知道他所思念的祖国并非理想之地，他思念中的祖国与现实中的祖国并不是同一个。在中国，无权无势的他是无法与人争胜的。郁达夫在他回国参加政府和教育局的考试时便知道了当时的中国的黑暗。“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46-47）？郁达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那时的中国是一块幽暗之地。想到那时的中国时，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落后、贫穷、愚昧、政治黑暗、社会压迫、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等词。就是在“五四”精英们眼中，旧中国和那时的国人们也不是用来爱和推崇的，而是用来推翻、改造的。“五四”精英们眼中的中国人还未成为真正的人。鲁迅对于那时的中国人也说过激愤的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1]因此，那时的郁达夫对那时的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不应被夸大。郁达夫所抨击的中国和中国人并非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甚至不是抗日战争爆发时的中国和中国人；那时留学日本的郁达夫也与后来参与抗日的郁达夫不同。总之，《沉沦》主人公的思念家乡和他的怀念故国只是他在用一个理想的、想象的故乡来反衬、说明他在日本的处境。因此，《沉沦》主人公的思乡所思的“祖国”并非现实的中国，他的思乡也不是真地思念现实中的祖国。

经常被用于说明《沉沦》的爱国情感的是下一段主人公在自杀之前说的话。《沉沦》结尾呼喊说：

>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75）

这段话一直被看作爱国情感的表达。但值得怀疑的是主人公是因为吃了“弱国子民”的苦而怨恨祖国的不够强大，还是想让祖国强大起来以改变同他一般的留日学生受歧视的状况？这两种情况看似相同，但情感的出发点不同。前者对祖国的情感是怨恨，怨恨祖国不强大以使自己在日本受尽歧视，他的出发点是自己；而后者的情感中没有那种怨恨的感情，并摆脱了对自我的关注，他是在为祖国、同胞们作考虑。然而，人们只乐意相信第二种解释，对第一种解释“视而不见”。

1《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比较-正文.indd 41 17-12-14 下午4:14

爱国主义阐释已然成了“定论”，是人们思考郁达夫和《沉沦》的先入之见，所以主人公呼喊的三句话中的第一句“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因为具有颠覆爱国主义阐释的可能，而被当做应当消除的“歧义”，常常被引用者在引用时删除。不思考“歧义”所具有的颠覆效果，将爱国主义阐释视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则不能反思爱国主义阐释的有效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将爱国主义阐释成为了思考的前提，使得与之不能相容的歧义被剔除掉了。删除这句话正因为这句话使得删除者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了另外的可能，但没能突破爱国主义阐释设定的思考框架。爱国主义阐释也使得读者认为《沉沦》的结尾突兀、不真实，因其歪曲了《沉沦》主人公的情感脉络。但从第一种解释看，虽然主人公呼喊祖国，但他的情感依然是个人化的，他的怨恨之情也是一贯的。因此，第一种解释才是更为符合《沉沦》主人公思想的阐释。《沉沦》主人公所关注的的确只是他自身，而非自己和祖国的关系。

与上一误解出于同一原因，人们容易将主人公的死归咎于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迫害。但实际上，《沉沦》中的日本人非但没有故意迫害主人公，还对他很友善，至少其中被写到的日本人是这样的；被认为迫害主人公的人也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还包括他的中国同胞和他的兄长。中国同胞和兄长同样被主人公认为是压迫自己的人，同日本人一样是主人公怨恨的对象，这点也常被爱国主义阐释有意忽略。日本人其实待主人公很好。他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旅馆主人出于善意没有要追究他的责任。不过是他自己觉得没脸见他们了，所以逃到A神宫附近的梅林居住。日本侍女去招待其他客人的正常行为，也让他感到受了轻视。日本人同学要与他交友，他故意摆出一副沉闷、忧愁的模样，把他们赶走了，却怪他们排挤他。他不但恨日本人，也恨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同学，只因为他们与日本人一样不能同情他的苦楚。“他的几个中国朋友，因此都说他是染了神经病了。他听了这对话之后，对了那几个中国同学，也同对日本学生一样，起了一种复仇的心。他同他的几个中国同学，一日一日的疏远起来”（57）。兄长因他花费太大而怀疑他“无行”，因此断了对他的接济，他便认为他的兄长也敌视他。[1]由以上分析可知，即便主人公受到的欺凌是真实的，欺凌的来源并非只是日本人，而是全体世人。《沉沦》的主人公的情感中虽然带有屈辱感，但他的情感更为准确和全面地说却是对全体世人的不满。因为这种愤世之情，主人公将自我置于世人的对立面，这个极端的自我始终是主人公做出判断的出发点。[2]然而主人公受到的欺凌、压迫实际上是虚拟的，也即是说主人公的被压迫感没有现实的来源，是虚拟的，虽然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践踏和歧视来自于他自己的哀怜癖，他倾向于沉溺在自己的感伤中不能自拔，并将自己视作世上最可怜的人，这也是郁达夫所说的“忧郁症”的一个方面。《沉沦》的叙事者说他习惯于“把自家的好处列举出来，把他所受的苦处，夸大的细数起来。他证明得自家是一个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同瀑布似的流下来”（64）。

以上的论述说明了三点内容。第一，《沉沦》中的感情并非爱国的热情，也不是强调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的民族屈辱感，而《沉沦》的主人公的所思所想，包括他感受到的民族屈辱感，始终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的。第二，主人公愤恨的对象不仅只是日本人，而是全体的世人，他恨的是整个现有的世界。与整个世界的对立使得主人公抗拒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事物，他的思想情感只能是个人的。因此主人公的情感更为准确地说是愤世之情。第三，主人公感到自己处处受人迫害、排挤，但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因此，主人公对世人的恨和对世界的恨有虚拟的性质。那么，既然主人公的受迫害的情况是虚拟的，他的被迫害感从何而来，他的愤世之情因何而产生？这是下文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1《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 郜淑禧，《郁达夫中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意义》，见李杭春等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9页。

比较-正文.indd 42 17-12-14 下午4:14

二、愤世之情的产生：被迫害的薄命诗人

道森的生平和史蒂文生的《夜宿》促成了郁达夫写作《银灰色的死》(24)。但至今，还没有人试图解决《银灰色的死》与史蒂文生的《夜宿》之间的关系。《沉沦》与《银灰色的死》写于同一时期，通过讨论《沉沦》与《夜宿》的关系，也可以知道为何郁达夫会说《银灰色的死》是根据《夜宿》写出来的。《夜宿》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下一段落中：

> “我天天忏悔，”诗人说道。“比可怜的弗朗西斯还肯专心忏悔的人也没有几个。至于改变，让别人来改变我的环境吧。一个人即使专为了他可以不断地去忏海，也得不断吃饭呀。”
>
> “这种改变得从心里开始，”老头子庄严地回答道。
>
> “我亲爱的爵爷，”维龙回答道，“你真以为我偷东西是为了找乐子吗？我恨偷窃就跟恨别的危险或别的工作一样。我看见了一个绞刑架牙齿就发抖。可是我得吃，我得喝，我得混在某种团体里。人不是一个孤孤单单的动物——一个男人总得要有个女人！要是叫我做御厨房的掌管……叫我做圣但尼斯教堂的执事，叫我做柏塔特拉克的执行吏，那我就真的要改变了。然而，只要你始终叫我做穷学者弗朗西斯·维龙，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哎，当然锣，我还是依然故我。”[1]

在这一段对话中，诗人维龙说他不是没有羞耻心和良心的人，但他的社会处境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偷而非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人是高尚还是卑贱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坏境而不是他的内心。维龙的话中包含了怨愤之情，他认为是现有的社会条件使得他这个原本高尚的人成了卑贱的小偷，是这个社会使他不得不堕落。因此只有改变现有的社会坏境，他才能变成他本该成为的高尚的人。这实际上是史蒂文生对整个使好人堕落为怀人的社会的诅咒。郁达夫说史蒂文生的《夜宿》影响了他的《银灰色的死》，正提醒了我们郁达夫思想中对现有社会的诅咒。这种思想一直都在郁达夫的脑中。所以在1929年的时候，郁达夫翻译了同样包含史蒂文生的这种观念的《浮浪者》(作者是爱尔兰作家Liam O'Flaherty)。其中的浮浪者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中，恶人总在发迹，而善人或老实人则一直在受穷。[2]郁达夫的《沉沦》也表现了这一思想，孤傲高洁的主人公被欺辱到只能逃遁山林，最后在堕落的忏悔中走向了自杀。郁达夫对施蒂纳的介绍也同样着眼于这一思想。[3]因此，可以说郁达夫认同了史蒂文生《夜宿》中反抗现有秩序的思想。对这一思想的接受与郁达夫当时名誉、金钱、女人一点也没有的处境有关（123）。一点也没有的感觉在郁达夫更像是一种被剥夺感和被压迫感，他的怨愤因此产生。

这种被剥夺感、被压迫感埋藏在郁达夫内心深处，与他对自我的想象相关。虽然郁达夫以小说闻名于世，但他始终将自己视作诗人。《沉沦》的主人公说：“诗人！我本来是一个诗人”(72)。郁达夫理解中的诗人是一群过着可“诅咒”的生活的“千古伤心人”。[4]在郁达夫眼中，诗人就是被压迫者。郁达夫对这一意义说得比较明白的一个地方是说“我们现代的社会，现代的人类，是我们的主人公的榨压机”。[5]郁达夫介绍施蒂纳、王尔德、《黄面志》一类的文学家时，他强调了社会对这些天才人物的不公和压迫。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可以明显见到郁达夫将自己看作这样的薄命天才的情况。他因此成了这些艺术家的后裔，

1 史蒂文生，《新天方夜谭》，汤真、万紫 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2《郁达夫全集》(第十二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3《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52页。
4《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
5《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比较-正文.indd 43 17-12-14 下午4:14

他的反抗和被压迫感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郁达夫眼中虽然困顿不堪，是被社会压迫得最为惨痛的人，但同时，他们也因此担负了反抗现有社会的重任。在郁达夫看来，艺术家的神经最为纤弱，总能最先感受到时代精神，成为为新时代鼓吹的旗手，但同时因为他的神经的纤弱，他对来自现有时代的一切压迫和不公感受得最为深切。简言之，郁达夫眼中的艺术家是被压迫者，他们对现时代的一切不满，他们要推翻压迫现有的世界。“如卢骚等，在政治上倡导了些高尚的理想，就不得不被放逐；又如凡尔伦(Verlaine)、淮尔特等在道德上宣传了些自由的福音，反而要被拘囚”。[1]这些作家的思想都趋向于消极，很难说他们是主动去反抗的人物，这种反抗实际上是消极被动的。但郁达夫认为他们是旧时代的反叛者、被压迫者和新时代的开路者。此处揭示了郁达夫对艺术家，特别是对天才薄命的艺术家的理解与常人的不同。这一点也被伊藤虎丸注意到，他用郁达夫对佐藤春夫的误解说明了这一点。“郁达夫的思想认识里，这样的‘艺术家’当然是对于权力者、富者所统治的世俗社会进行社会的政治的反抗的‘反抗者’。(这是和他把世纪末的文人、‘薄幸天才’E. Dowson看成是和庶民之间没有隔阂的‘民主主义的人’的情况是同样的。)但这里已经产生了对于春夫的误解。而对于‘艺术家’的理解，也出现了微妙的分歧。”波德莱尔、魏尔伦等颇带唯美、颓废色彩的诗人被郁达夫认为是最具反抗意志的人物。[2]

郁达夫对这些艺术家的理解存在偏差，他将他们的消极隐遁看作积极的反抗。这种理解虽然让人觉得怪异，但从这一理解的偏差入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郁达夫将他自己的颓废、消极的作品看作对既有秩序的攻击的做法。同样是出自史蒂文生《夜宿》中的逻辑，郁达夫认为是这个腐败、压抑的社会使得善人堕落下来，他的主人公们的堕落是他们的社会处境造成的。郁达夫描写这些纯洁善良的人物的堕落，在他的理解中，便是对既有的使人堕落的社会秩序的控诉。所以郁达夫的《达夫全集·自序》中有一句让苏雪林不得其解的话：“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吃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也相差很远的军人。那我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3]苏雪林说郁达夫一面写着颓废堕落的文字，一面却让读者去上阵杀敌，真是咄咄怪事。[4]但联系到郁达夫对艺术家的理解，特别是对道森、《黄面志》等作家的理解，我们便可以理解郁达夫的逻辑了。郁达夫认为只有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才能让他的主人公们免于堕落和自戕。

郁达夫理解的艺术家有革命、反抗的一面。但需要说明的是，郁达夫对艺术家的理解与他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非常不同。郁达夫是从社会层面来理解艺术家的，但他是从美感层面来理解艺术作品的。所以，虽然郁达夫将艺术家看作反抗者的领路人，他们的身份在郁达夫眼中是公共的；但艺术作品中表达的情感却可以像《沉沦》一样是私人的，表达的是与反抗、革命无涉的内容。因此，前文说《沉沦》中的情感是个人的并不与郁达夫对艺术家的理解背离。我们可以从郁达夫创作《沉沦》的意图来理解郁达夫对艺术作品的看法。郁达夫回忆《沉沦》小说集的写作时，说道：“《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是成于一个时期的，年代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当时的国内，虽则已有一班人在提倡文学革命，然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专在思想方面，于纯文学的讨论创作，还是很少。”[1]所以他的《沉沦》小说集的三篇小说实际上在他的观念之中，属于纯文学的内容，而与政治、道德、伦理的讨论关系不大，更不是宣传。郁达夫更说《沉沦》和《南迁》，“其中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留

1《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2《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3《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页。
4 苏雪林，《郁达夫论》，见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
5《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

比较-正文.indd 44 17-12-14 下午4:14

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作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的点缀了几笔。”[1]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压迫正可以作为激发中国人爱国情绪的最好题材，而郁达夫居然不愿意用力去写，以避免被人看作是宣传的小说。所以他是有意追求纯文学，让他的小说避免社会色彩。郁达夫说的纯文学指的是为文学而作的文学，不为功利和社会效果的文学，也不被道德伦理所束缚。郁达夫在这里表达的文学观念来自于唯美主义。

三、被迫害感的逻辑：“生活模仿艺术”

郁达夫在他编译的《文学概论》中引用了王尔德《谎言的衰朽》中的观点“并不是人生创造艺术，却是艺术创造人生”。[2]在《谎言的衰朽》中，王尔德提出了“生活模仿艺术”观念。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表现最高的美，而生活及自然是贫乏的、丑陋的。所以他颠倒了西方摹仿伦中艺术反映人生的观点，认为恰好相反，应当让人生模仿艺术，从而使生活艺术化。郁达夫对这一观念的接受表征在两方面上。第一，他与王尔德一样认为艺术是谎言。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说现实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作家没有说谎的才能，所以艺术衰朽了，要复活艺术需要变假成真的才能。郁达夫在《我承认是“失败”了》中也将艺术看作虚假、骗人的东西，而艺术的失败在于它无法骗到人，说出的是“非艺术的谎话”。[3]将艺术与谎言联系在一起的奇特想法源出于王尔德，郁达夫的话移用了王尔德的这个观点。郁达夫还作过一篇以《说谎的衰落》为题的文章，这个题名就是郁达夫对“谎言的衰朽”的翻译。第二，他与王尔德一样强调艺术想象，反对模仿自然。郁达夫在纪念左拉的文章《左拉诞生百年纪念》中批评左拉时，批评的作品、采用的立场和话语也都来自于王尔德的《谎言的衰朽》。他们的批评立场可以从王尔德的话中看出：“事实不仅正在历史中找到立足点，而且正在篡夺想象力的领地，侵入到浪漫文学的王国中来。”[4]王尔德批评左拉的代表作的话是：“有的时候，在他的作品如《萌芽》中，确实有着某种几乎可以称为史诗的东西。但是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全是错误的，不是基于道德的错误，而是基于艺术的错误……从艺术的观点看，能对《小酒店》、《娜娜》、《家常琐事》的作者有何恭维之辞呢？没有。”[5]而郁达夫批评左拉，“到了他（左拉）实验主义成熟，浪漫主义几近脱尽时的那三部四福音小说写成之日，他的精神力已经交瘁，那三部大作，却成为干燥无味的作品了。”[6]郁达夫的这篇文章在立场上和判断上都与王尔德的《谎言的衰朽》对左拉的批评一模一样。他们都批评自然主义文学排斥想象，而将枯燥丑陋的生活照搬到了文学之中，批评的对象都是左拉的那三部作品。由这两方面可以看出，郁达夫接受了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观念。

“生活模仿艺术”并非只是一种艺术观，它还是一种人生观。它发现了人们将艺术转变为自己的生活的现象，并且鼓励人们这么做，让现实或虚构的人去重复一种艺术化了的人生。郁达夫说：“我们因为想满足我们的艺术的要求而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依理应该是艺术的。”[7]这种艺术化的人生的典型见于于斯曼的《逆天》，王尔德正是受这部小说的影响确立了“生活模仿艺术”的观念。按照王尔德的观点，文学是生活方式的先锋，生活只能在文学之后模仿它的各种形态，因此可以说是文学浇铸了生活，而非艺术模仿生活。

> “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生活是给艺术照镜子，不是复制画家或雕塑家想象出来的某个奇怪典型，就是在事实上实现虚构中所梦想的东西。科学地说，生活

1《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2《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6页。
3《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4《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
5《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29页。
6《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47页。
7《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比较-正文.indd 45 17-12-14 下午4:14

> 的基础——生活的活力，如亚里士多德会称呼它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要求表达的愿望，艺术总是显现使表达得以实现的各种各样形式。生活占有它们，利用它们，即使它们对她自身有伤害。年轻人自杀是因为劳拉这样做过，他们死于自己手下是因为维特死于自己手下。请想一想我们从模仿基督、模仿凯撒中所得到的一切吧！”[1]

艺术化了的人生形态既可以来自于虚构的文学作品，也可以来自于历史。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或历史中的人物都同样经过了美化和理想化，他们源于现实，但却经过了虚构的处理，与真实的影像已然不同。不论何种情况，人的自我想象总是体现出某种理想化的追求，并使自己与这种理想等同。“生活模仿艺术”的模仿是通过想象自我完成的。这种情况见于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将主人公想象成道森，《采石矶》中将主人公想象成黄仲则。郁达夫将这些历史或文学中的光辉人物的人格特征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并与自己的经历融合，使这些作品成为自叙传。这些主人公是曾受到贬抑和迫害的人物，也是郁达夫自叙传中的自己，这些人物生前的痛苦和死后的哀荣为郁达夫的自我想象增添了荣光，也为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的人格塑造提供了框架。

郁达夫用megalomania（自我狂妄者）一词来形容《沉沦》中的主人公。因为这种自我狂妄，主人公将自己想象成历史或文学中的各式人物，将自我浪漫化，自我想象为一个不容于世的天才，并以想象的自我处世，最终酿成了悲剧。他逃离到人迹稀少的A神宫附近的梅林以避开那些被他看作“庸人”的人，这些人不但包括侵略了中国的日本人，也包括与他一同留学于日本的同学，甚至包括了他的兄长。他认为世间的庸人都在妒忌他，轻笑他，愚弄他（40）。总之，他与世人不能相容，而不仅仅只是与日本人不能相容，他感到受了所有人的敌视，“像你这样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样的虐待，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64）。所以，《沉沦》并不是一篇反映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普遍处境的小说，主人公仇恨的对象包括了日本人，但不仅只是日本人，他还恨自己的中国同胞和兄长。因此他的仇恨与国仇并不相同。在将他人想作庸人和迫害者的同时，主人公也将自己视为因拥有才能而被迫害的人。如《沉沦》中的主人公将自己想象成不容于世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个未来的预言家，因为他的天才无法为庸众所理解，所以受到迫害和敌视。这样的心境从1916年起，就存在于郁达夫身上。郁达夫在1916年寒假搬到梅林时，已经抱着《沉沦》主人公厌世的心情了。“弟每欲学鲁滨孙之独居荒岛，不与世人往来。因弟已看破世界，尽为恶魔变相……”[2]这里的梅林就是《沉沦》的主人公后来独自一人居住的地方。也因为这种自我狂妄的幻想，主人公自认是耶稣。“他觉得自家好像已经变了几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样子，对了这自然的默示，他不觉笑起自家的气量狭小起来。‘赦饶了！赦饶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来，你们都来同我讲和罢’”（65）！自比为耶稣的不仅是《沉沦》的主人公，也是郁达夫自己。郁达夫在《还乡记》中说：“你们的灾殃，你们的不幸，全交给了我，凡地上的一切苦恼，患难，索性由我一个人负担了去罢！”[3]这种为了世人，牺牲自我以担荷一切罪恶的行为，实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创举。因为不能与常人正常相处，主人公觉得自己受到迫害和流放。又因为主人公感到被迫害和流放，他无法与常人相处。他的自我想象与现实处境相互促进，不断把他推向最边缘、最孤独的位置。自我想象使得他与众人不能正常地相处，而常常摆出孤高、忧郁的样子。因为只有孤高的姿态才能让他想象自己为查拉图斯特拉和耶稣一般的救世者，只有忧郁才能说明他的痛苦和忧愁的深重。“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改装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1《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8-349页。
2《郁达夫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比较-正文.indd 46 17-12-14 下午4:14

(43)。这种忧愁和痛苦实际上也只是自我想象的产物，但却使得他交游离绝，最后陷入绝境。但这种绝境却正是他的自我想象所需要的：天才的救世者似乎只有与世不能相容才能突出他的才能。

《沉沦》主人公的“遗世独立”和“不容于世俗”是营造自我形象的方式，模仿了历史上各式人物的生平，如屈原的。《沉沦》的主人公在自杀的方式和自杀的原因的模拟上大有可以牵强附会、比拟于屈原的地方，虽然他并没有屈原的爱国情感。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郁达夫和《沉沦》的主人公也同样受到了自己敬慕的人的怀疑和污蔑。郁曼陀怀疑郁达夫行为不检，“曼兄疑予无行”，所以断了对郁达夫接济，而郁达夫出于愤恨与他绝交。这点对郁达夫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郁达夫因与他的兄长决裂，而对人性不能信任，认为兄弟骨肉间的情谊都是不可靠的，那么别的情感更无需讨论了。郁达夫因为对人性不能信任而主动疏远了朋友，“自与曼兄绝交后，予之旧友一朝弃尽。”[1]《沉沦》复现了与兄长交恶对郁达夫产生的影响：“同室操戈，事更甚于他姓之相争”；“自家的弟兄，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63-64)！与兄长的交恶对郁达夫的影响之大，可见于他在1917年2月25号草拟的一张遗言传。郁达夫在当时有过自杀的想法，并且曾在日记中自比为“怀沙逐落入海孤臣”，[2]将自己比作屈原。

主人公的自我想象和现实处境在他嫖妓之后，终于从相互促进的状态变为相互否定的状态。在他去了娼馆之后，不但身体受到了玷污，而且理性让步于身体的欲望，精神也由此堕落了。他自此失去了自我想象为纯洁高尚的人的权利，想象的自我遭到否定。这在郁达夫也是实有其事。郁达夫第一次逛妓院是在1917年12月19日，他在20日的日记中写道：“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万恶之端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3]郁达夫在这里将精神与肉体对立起来，没有情感而只是肉体买卖产生的交合被郁达夫本人也视为堕落的。一旦陷入肉体的堕落，人便失去了高尚的灵魂。这种逻辑虽然简单，但在那半开化、半封建的时代中却有绝大的力量。主人公因此失去了他过去处世的根本，这也是他最后自杀的原因。至于主人公模仿了爱国诗人屈原的自沉，可以理解为他最后的自我想象。但结尾的悲剧或许也在他的自我想象之中，“死”在他看来是自我的最终实现。在这种想象中，他将自身的失败和痛苦归咎于祖国的失败和落后，将自身等同于祖国，祖国的陆沉便是他的堕落。这是自我崇高、自我想象的一种极端方式，在想象之中升华了自我。怀才不遇，受尽迫害，忧思发愤，自沉殉国，暗中模仿了屈原之死，将自我推向了最后的崇高。但《沉沦》主人公的殉国终只是一种虚拟的姿态和形式上的模仿。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1《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郁达夫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3《郁达夫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WATERMARKED

比较-正文.indd 47 17-12-14 下午4:14